

千歲丸成員高杉晉作的中國觀

歷史四 彭啟祐

摘要

高杉晉作在前往上海以前，與政治活動尚保持距離。然而回國後高杉晉作便致力於各種政治活動，實現其攘夷的思想。雖然他在特殊的時間、地點上的觀察，並非整個中國的全貌。但這樣的中國經歷仍帶給高杉晉作對於西洋入侵、國家陷入內亂的危機感。因此在思想上這次的中國經歷扮演了催化劑，促使了日後高杉晉作對於攘夷的實行。

關鍵詞：高杉晉作、千歲丸、上海、中國觀

一、前言

1. 研究動機

作為鄰居，中國與日本自古就有長期的交流，儘管江戶時期日本進入所謂「鎖國」的狀態，兩國沒有正式的國交關係，但仍與中國保持著密切的貿易關係。而千歲丸的派遣，打破了中日貿易上「有往無來」的狀態，¹也打破了中日兩國政府官員不直接接觸的狀態。作為德川幕府首次的「出貿易」，²除了貿易的動機之外，也包含了貿易視察的意圖，³將此作為開國後的出海試驗，前往上海就近探查西洋文明，並觀察戰事。⁴於是日本透過西洋引介，⁵循著中國的貿易秩序進入中國市場。在經過一番交流後，中國也多少察覺到日本的主要目的並非只是來中國貿易而已。⁶

千歲丸的成員留下了豐富的記錄，例如高杉晉作的《游清五錄》，名倉信敦的《海外日錄》，納富介次郎的《上海雜記》，日比野輝寬的《贅狀錄》、《沒鼻筆記》，中牟田倉之助《上海行日記》的等等。從以上的記錄中，可見成員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以及他們對時事以及對中國的評價。其中有些人則活到了明治時代，甚至有成為明治政府官員者，例如成為大藏省官員的日比野輝寬和成為外務省官員的名倉信敦，中牟田倉之助則成為了海軍軍令部長。⁷其中名倉信敦其提倡的日清尋盟論，甚至有可能對1871年的中日修好條規造成影響。⁸可以說，千歲丸的成員很多都是日本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因此他們在這趟睽違兩百年的「出貿易」中的中國觀，也有其討

¹ 廖敏淑，《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7），頁137。

² 森田吉彥，〈日清關係の轉換と日清修好條規〉，收入《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頁47。

³ 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50。

⁴ 大塚武松編，《夷匪入港錄·第一》（東京：日本史籍協會，1930），頁288。

⁵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商人擬來滬貿易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檔》，檔案號01-21-022-01-001。

⁶ 川島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頁219。

⁷ 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頁57-60。

⁸ 森田吉彥，〈日清關係の轉換と日清修好條規〉，頁51。

論的價值。

而其中高杉晉作雖然於1867年過世，但其1862年歸國後，便投身於各種政治活動，對日後長州的攘夷、倒幕運動有極大的影響。因此本文希望透過探討高杉晉作的經歷，去檢視為何他會有此中國觀，在中國觀的部分，主要圍繞高杉晉作的《游清五錄》，並且與其他成員的記錄相對照，希望藉此討論高杉晉作的中國觀，以及和其他成員的差異。

2. 文獻回顧

對於千歲丸成員記錄的相關的研究不在少數。專書有馮天瑜的《「千歲丸」上海行》，本書其主要著重在中國觀，以及文化方面的探討。而此書在中文圈的研究上常被引用，可說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在易惠莉的〈1862年日本「千歲丸」訪滬武士筆下的中國士紳考論〉⁹中，主要著重在千歲丸成員記錄中的中國仕紳，對於兩者之間的交流的討論，而對於這些中國仕紳的生平以及後續動向，也都有詳細的記述。此外還有橫山宏章的〈文久二年幕府派遣「千歲丸」隨員の中國觀〉¹⁰，他認為千歲丸成員看到中國在內憂外患下國家積弱不振的狀況。這加深了日本的危機感，同時也讓日本萌發了藐視中國的心理。

關於千歲丸成員個別的研究，有章霖的〈試論上海之行對高杉晉作攘夷思想的影響〉¹¹，他認為上海的經歷使高杉晉作原有的攘夷思想更為清晰明確，並且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和逐漸成熟。岡部三智雄的碩士論文〈日本治臺前來臺日人之研究〉¹²，其關於名倉信敦的生平、對外觀以及相關史料，都有

⁹ 易惠莉，〈1862年日本「千歲丸」訪滬武士筆下的中國士紳考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4(香港，2004)，頁163-189。

¹⁰ 橫山宏章，〈文久二年幕府派遣「千歲丸」隨員の中國觀〉，《県立長崎シーボルト大学国際情報学部紀要》，3(長崎，2003)，頁197-206。

¹¹ 章霖，〈試論上海之行對高杉晉作攘夷思想的影響〉(浙江：浙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4)，頁38。

¹² 岡部三智雄，〈日本治臺前來臺日人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52-54。

詳細的整理。在謝詠的〈名倉予何人筆談史料初探〉¹³中，也有對名倉信敦的生進行整理，也對名倉信敦在上海的記錄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森田吉彥的〈兵学者名倉信敦の幕末海外見聞〉，¹⁴主要是針對名倉信敦在上海見聞的紀錄，以及其後續出訪西洋的討論。其中也對名倉信敦對中華文化的欽慕，對兵學的重視，以及對西洋的憎惡進行深入的分析。車政弘、降旗英史的〈日本近代デザインの草創期：納富介次郎について その2〉，¹⁵則是關於納富介次郎在上海見聞紀錄的討論。

在史料方面，本文主要是利用千歲丸成員留下的日記，作為討論的對象。依照馮天瑜在《「千歲丸」上海行》的整理，目前總共留下的記錄有17篇，其中16篇是藩土的記錄，而幕府官吏則都沒有留下個人的中國見聞記錄。其中納富介次郎、日比野輝寬所著的三篇記錄，收入在《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的第一卷中；峰浩、名倉信敦、松田屋伴吉的五篇記錄，收入在《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錄集成》的第十一卷中；中牟田倉之助的記錄收入在《子爵中牟田倉之助傳》中；¹⁶高杉晉作的記錄收入在《東行先生遺文》中。由於本文以高杉晉作的中國觀為主要討論對象，因此史料以高杉晉作的《游清五錄》為主，並以其他成員的記錄作為對照、比較的對象。

二、高杉晉作之生平及思想

作為幕末史的重要人物，關於高杉晉作的經歷已有許多論述。本文主要以其思想方面為中心，透過整理其經歷，試圖找出對其思想影響重大的人物，以便釐清其思想。

高杉晉作於1839年，出生在長門國萩城下菊屋橫丁，其父為高杉小忠太為長州藩的世臣，食祿200石。其祖高杉氏自16世紀，長州藩祖毛利元就的

¹³ 謝詠，〈名倉予何人筆談史料初探〉（浙江：浙江工商大學亞非語言文學碩士論文，2017），頁99-106。

¹⁴ 森田吉彥，〈兵学者名倉信敦の幕末海外見聞〉，《帝京大学文學部紀要》，40（東京，2009.1），頁45-81。

¹⁵ 車政弘、降旗英史，〈日本近代デザインの草創期：納富介次郎について その2〉，《デザイン学研究》，1977：26（東京，1977），頁76-77。

¹⁶ 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頁59-60。

時代就已經跟隨毛利家。¹⁷19歲時進入藩校明倫館，同年也於吉田松陰的松下村塾中學習。¹⁸松下村塾孕育出了許多攘夷派、倒幕派的重要人物，例如久坂玄瑞、入江九一等等。甚至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明治政府的重要人物也曾於松下村塾學習過。高杉晉作和久坂玄瑞被合稱為「村塾的雙璧」，也是「松門四天王」¹⁹其中之一。兩人在松下村塾中與其說是學生，更像是老師。²⁰可見，高杉晉作的才學，是有一定的水平的。在思想上，高杉晉作可說是受到攘夷論者吉田松陰的影響極大。吉田松陰的思想可說是十分激進，例如在《幽囚錄》²¹中關於對外關係：

日不升則昃，月不盈則虧，國不隆則替。故善保國者，不徒無失其所有，又有增其所無。今急修武備、艦略具、礮略足。則宜開墾蝦夷封建諸侯、乘間奪加摸察加·奧都加。諭琉球，朝覲會同，比內諸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洲之地，南收臺灣、呂宋諸島，漸示進取之勢。然後愛民養士，慎守邊圉則可謂善保國矣。不然坐于群夷爭聚之中，無能舉足搖手，而國不替者，其幾與。²²（標點為筆者所加）

可此為十分本國中心的思想，同時也是十分有侵略性的想法，對於周邊國家，如中國、朝鮮等，也只將其視為國家走向富強的墊腳石。而高杉晉作的思想，似乎多少也受其影響。例如，關於王者不治夷夷論，²³高杉晉作這樣寫道：

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今之夷狄，已非春秋，而議者猶欲執春秋

¹⁷ 香川政一，《高杉晉作小伝》（下關：白銀日新堂，1936），頁5-6。

¹⁸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年譜〉（東京：民友社，1916），頁1-2。

¹⁹ 為高杉晉作、久坂玄瑞、吉田稔磨、入江九一。

²⁰ 吉野忠男、廣瀬朋美，〈人材育成の繼承：松下村塾の事例(2)〉，《大阪経大論集》，65：2（大阪，2014），頁295-296。

²¹ 為吉田松陰於1854年，在獄中所作。

²² 吉田松陰，《幽囚錄》（東京：吉川半七，1891），頁13。

²³ 應是指〈王者不治夷狄論〉，本文先按照《東行先生遺文》的寫法。

之死例行不治之道，謬亦甚矣。使天下生于今日春秋，必謂夷狄不可不治，不治必為夷狄所治而已。故吾常私意，天子一曰，憤然下敕，率獎天下忠義之士，揮神戟于五大洲，使五大洲皆為吾屬國，則萬事不拔之業，自是建矣。今日之腐儒，不知時事，雖讀春秋，和足以之夫子之志哉。²⁴

可見在對外關係上，其思想與吉田松陰十分類似，皆是希望向外擴張以保全國家。高杉晉作認為與其只求自身國家的內部穩定，不如透過對外擴張，先發制人以解決問題。因此，面對西洋的入侵，高杉晉作認為極具攻擊性的攘夷行動，是有助於國家脫離被列強入侵的狀況，而這樣的思想也於之後付諸實行。

但由於高杉晉作為獨子，加上對於父親命令的遵從，以及對於家人安危的顧慮，因此儘管對政治運動抱有強烈的動機，但在前往上海以前並無涉足太多政治活動。在私下的信件中也表現出其不得不遵守父命，²⁵導致無法如其他同志一同投身政治運動的無奈。²⁶之後高杉晉作於1858年前往江戶進入昌平黌學習，但隔年便接受藩命回到長州，從昌平黌退學。於1860年成為明倫館舍長，期間為修習海軍蒸氣科曾一度前往江戶。隔年成為小姓，之後也多次前往江戶。²⁷1862年時奉藩命乘千歲丸前往上海。

如前所述，高杉晉作早先由於對於家人的顧慮，難以放手參與政治活動，然而卻搭上了1862年的千歲丸前往上海。原因是由於高杉晉作是由藩內部所任命前往上海考察的關係。²⁸由於是藩命，因此作為獨子的高杉晉作也

²⁴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書翰〉，頁27-28。

²⁵ 恩師吉田松陰企圖安殺老中間部詮勝而下獄時，高杉給久坂玄瑞和中谷正亮書信中的內容：「僕一つの愚父を持ち居り、日夜僕を呼び付け俗論を申聞かせ、先達て死に候大父なども、毎事僕うい呼よせ、何卒大なる事を致してくれるな、父様の役にもかかわるからと申候故、松下塾へ参るさいも、かくして居候位の事に候。」 香川政一，《高杉晉作小伝》，頁22-23。

²⁶ 章霖，〈試論上海之行對高杉晉作攘夷思想的影響〉，頁6。

²⁷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年譜〉，頁4。

²⁸ 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頁68。

不得不遵守，甚至其較為保守的父親都鼓勵贊成其前往上海。²⁹

從上海回國後，便於年底同久坂玄瑞、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將建設中的英國公使館燒毀，此為高杉晉作首次進行攘夷的行動。1863年，長州藩依照孝明天皇命下的攘夷期限，對經過關門海峽的英法美荷四國艦隊進行砲擊。高杉晉作也參與其中，並於同年組織奇兵隊。隔年禁門之變發生前，主張慎重、不應隨意進軍的高杉晉作受藩主世子之命勸退來島又兵衛其進軍京都未果，因此脫藩前往京都，但沒有參與禁門之變。然而當初的「松門四天王」中的久坂玄瑞、入江九一於禁門之變中死亡，吉田稔磨則是在早先的池田屋事件中死亡。同時，長州藩也因為第一次長州征討的壓力而轉向恭順。而後高杉晉作也因為擅自脫藩的罪名下獄。但同年八月卻被負責和四國聯合艦隊講和談判。隔年1865年，主張項幕府抗戰的高杉晉作一派一掃藩內恭順派取得藩論的主導，並於1866年的第二次長州征討中多次擊敗聯軍。但同年卻身體狀況急遽惡化，並於隔年三月去世。³⁰

以上可見，自1862年從上海回國後，高杉晉作便踴躍的參與政治活動。小至襲擊洋人，大至對西洋諸國的作戰都有其參與，且在政治地位上，高杉晉作也逐漸成為藩中要角，不但負責與四國聯合艦隊講和，甚至在第一次長州征討後的藩內動亂中，在藩內取得領導地位。關於高杉晉作回國後攘夷的思想，章霖整理出以下三點，首先是外患，高杉晉作在上海看到中國人被西方勢力壓制的觀察，第二是太平天國造成的中國國內動盪不安，第三是為了避免重蹈中國的覆轍，日本必須透過攘夷來保持獨立性。在此章霖認為，雖然高杉晉作出國以前便已有攘夷的思想，但這次的中國經驗使其攘夷思想更加清晰明確。因此，在上海看到中國在內憂外患的衰微後，其思想產生了變化。導致其回國後，從之前的與政治活動保持距離，變成積極從事並走上攘夷之路。³¹但關於此說法，筆者認為還是有檢討的餘地，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高杉晉作在中國的見聞。以下就高杉晉作的《游清五錄》為主，來整理

²⁹ 予受支那行之命，告家君曰，兒性鈍才疎，不計承此大命。且兒無兄弟，今遠遊于海外，無為家君膝下之養者也。家君曰：「汝闇愚少年何以當此大任，然君命一下不可如何也，汝勉強不以為我念，而可以死奉君命矣。」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頁72。

³⁰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年譜〉，頁5-19。

³¹ 章霖，〈試論上海之行對高杉晉作攘夷思想的影響〉，頁36-38。

出高杉晉作的中國觀，並討論這趟中國經歷對於高杉晉作的影響。

三、千歲丸成員高杉晉作所見的清朝

《游清五錄》為高杉晉作所著，記錄其搭乘千歲丸前往上海之所見所聞。可見其利用自由活動的時間，到處遊歷的觀察和與中國人的筆談等等。本節筆者主要討論《游清五錄》中，高杉晉作在上海的所見所聞以及其中的中國觀，並討論這趟中國經歷對於高杉晉作的影響。同時輔以其他成員的紀錄作為比較。

1. 對中國對外關係的觀察

由於千歲丸是以荷蘭船的名義，透過荷蘭的通商規則進行報關進入上海的，³²因此，千歲丸成員在居住上，也是在商海租界內。高杉晉作和幕府官吏都被安排居住在宏記洋行，³³於上海縣城北部不遠處，處在法國租界內，並且在法國使館和荷蘭使館之間。³⁴因此，作為第一印象，再加上是千歲丸成員的居所，必定時常經過，因此也能夠進行較為詳細的觀察。因此，租界的見聞對於千歲丸成員的中國觀來說，其影響不容小覷。

首先，在租界的問題上，可以看到高杉晉作對於所謂「領事裁判權」的觀察。高杉晉作在與顏慶的筆談中提到：

高杉：「聞上海中賞罰之權盡歸英佛二夷，信否。」

顏：「英佛只管英佛士民，至本國事務，自有本官辦理。」

高杉：「城外之地盡係英佛之所管歟。」

顏：「北門外歸英佛，餘仍隸屬本朝。」³⁵

以上可見，清朝在司法上屬人主義的管理方式。若從西方民族國家的視角觀

³²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商人擬來滬貿易事〉，檔案號01-21-022-01-001。

³³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頁77。

³⁴ 藤田佳久，〈幕末期に上海を訪れた日本人青年藩士たちの行動空間〉，《同文書院記念報》，24(豊橋，2016)，頁147。

³⁵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頁110。

看，將此視為喪權辱國之舉，認為此侵害了國家司法主權。但若從清朝中國的視角觀看的話，所謂「領事裁判權」其實只是清朝「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法律秩序之展現。在南京條約簽訂以前，在通商口岸的外國人司法案件，認為若是同類相犯，則不必以內地法律審理。³⁶就算在南京條約簽訂後，也無太大變化。在五口通商章程的第十三款中，提到：「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華民如何科罪，應治以中國之法，均應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後條款辦理。」顏馨所說的「英佛只管英佛士民，至本國事務，自有本官辦理」就是符合以上情況。此外，尼布楚條約被認為是清朝與俄國簽訂的對等條約，在司法案件的部分，也是說明由雙方各自負責審理本國人民。清朝在與英法簽訂條約後，兩國也從互市國成為與國，其中所謂的「領事裁判權」應該也是清朝的法律習慣意志的展現。³⁷

而高杉晉作之所以會有「賞罰之權盡歸英佛二夷」的疑問，筆者認為可能是高杉晉作在租界看見中國人面對洋人時表現得較為卑微的姿態。例如：

「支那人盡為外國人之使役，英法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旁讓道，實上海之地雖為屬支那，謂英佛屬地又可也。」³⁸筆者認為，若這些為外國人使役中國人的為雇傭，那麼就只是個正常現象。又因為千歲丸成員多為武士階層，為社會上層，對於下層民眾自然會有比較輕視的看法。例如在道台府待客後的剩菜隨即被衙役們分食一空，在日比野掬次和納富介次郎都對此現象感到十分反感。³⁹在這種身分差距下，作為武士階層的千歲丸成員自然就容易產生中國人落伍敗壞的感覺。相反地，居於上海的洋人則較為和千歲丸成員們一樣，為的社會上層，雇用著中國人。比較之下，便會產生中國人盡為外國人使役的看法。

接著，在外政關係的問題上，高杉晉作在關於俄羅斯的問題上，向中國人問道：

高杉：「貴邦與歐羅斯和親最好，近世之世情如何。」

³⁶ 廖敏淑，《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374-375。

³⁷ 廖敏淑，《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380-384。

³⁸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頁79。

³⁹ 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頁116-119。

中國人：「俄羅斯國，在敝國通商，感我朝厚恩，所以助兵助餉之舉。和親之說，想是齊東野人語耳。」

高杉：「口唱聖賢之語，身為夷狄所役。齊東野人，真齊東野人耶。嗚呼浮文空詩何足當，目無一丁字兵卒，可嘆可歎。」⁴⁰

默耶洋行訪李翼周，筆話。

高杉：「嘗聞貴邦與歐羅斯和親最好，又聞貿易多於陸路信否。」

李：「和親絕無，每年北口外交易。」

高杉：「北口外何州何地乎。」

李：「無州名無地名，乃歐羅斯境。」⁴¹

以上可見高杉晉作對於中國人的回答不甚滿意，甚至看不起這些中國人。在《「千歲丸」上海行》中馮天瑜認為高杉晉作觀察到俄羅斯以友好之名，行侵略之實。並認為中國還還在自我陶醉，認為俄羅斯是「感我朝厚恩」才協助中國。⁴²實際上俄羅斯為清朝的與國，雙方有國交關係且地位平等。但就文中「齊東野人語耳」這句話來說，中國人只是否定「和親」一說而已。由於日語中的「和親」是為交好的意思，相似詞有親善、修好，⁴³例如1854年與美國所簽訂，被稱為開國起點的「日米和親條約」。由於雙方對漢字理解上的差異而產生誤會，因此才會認為中國人否定事實，自我陶醉。在此筆者認為高杉晉作不滿的點為中國人否定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因此才又找了另一個中國人詢問，結果仍然得到相同的答案。而文中「每年北口外交易」的地點，應該指的是於中俄邊境的恰克圖與買賣城，恰克圖在俄羅斯境內，買賣城則中國。區內為免稅交易，不課交易稅和商品稅。⁴⁴因此與俄羅斯的陸路交易場所應該為邊境城市，中俄兩側則以不同名稱稱呼之。俄羅斯為清朝與國，尼布楚條約以來兩國國交關係已有百年之久。在峯源藏與中國人顧麟

⁴⁰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頁115。

⁴¹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頁117。

⁴² 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頁219。

⁴³ goo 国語辞書：仲よくすること。親しみ合うこと。〈goo 国語辞書〉，<https://is.gd/LWrgU1>，擷取日期：2023年1月19日。

⁴⁴ 廖敏淑，《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88-89。

的談話中也能見到：

峯：「俄羅斯近日之情如何，嘗聞頗垂顧于貴邦，信乎。」

顧：「俄羅斯前年有黑龍江之割，現今已和好。」

又問曰：「聞英、仏、花旗、阿蘭陀等，亦畏俄羅斯，信乎。」

顧：「然」

按スルニ五大洲中大国多シト雖トモ、大抵目前ノ富強ヲ争ヒ遠大ノ計策ナシ。甚シキハ只二一日又一日ヲ送ルノミニテ絶テ進取ノ慮リナキ者アリ。俄羅斯ノ如キハ目前ノ利ヲ争ハス、惟遠望是務ム。是各国ノ畏ル、所以ナリ。⁴⁵

以上可見，千歲丸成員所訪問的中國人，多對於中俄關係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對於俄羅斯的看法也較於正面，甚至將其看做一個比英美法還要強大的國家。實際上，對於清朝來說，作為與國的俄羅斯的確是一個與中國對等，且承認其大國地位的國家。⁴⁶

2. 軍事觀察

千歲丸抵達上海時，正值太平天國之亂，此時太平軍兵臨上海，因此考察時常見到洋人的軍隊。而對於在討伐太平天國時「華洋會剿」的現象，中國部隊與洋人部隊共同作戰。由於太平軍逼近上海，但清軍難以即時趕到上海，因此只好和洋人一同抵禦太平軍。⁴⁷在高杉晉作與中國部隊的玩松的談話中也能看到相關內容：

高杉：「貴邦與外國和親最好是何國。」

玩：「現在英法二國為總，以下小國不少，不知詳細處。交易本係往

⁴⁵ 小島晉治，《幕末明治中国見聞録集成 第11卷》（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頁33。

⁴⁶ 廖敏淑，《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82-84。

⁴⁷ 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頁172。

來，現軍兵共議中外會剿，名謂會防局。」⁴⁸

千歲丸成員對此現象十分反感，認為此有損國家、文化尊嚴。例如峯源藏在與管慶樞的對話中也提到關於引入境外勢力用以平定內亂為導致的危險：

峯：「吾前問之道台從者，則不如此多，而其說不詳。故復問之。今聞一万二千餘兵。然則何為借英仏之兵哉。」

管：「上年十二月時，新撫台尚未到上海。所有兵勇軍在安慶地方。離此有七白餘里。是以請借英仏二国助守城地。」

峯：「今借英仏之兵，他日貼石晋之患，其如之何。抑以英仏心情為何倚信乎。」

管：「此乃上年危急之秋，不暇慮及，且顧目前之計。」⁴⁹

按スルニ昔シ石敬瑭、夷狄ノ力ヲ借りテ終ニ其ヲ大患遺ス。今清国唯其力ヲ借ルノミナラス、自ラ其城ヲ守ルコト能ハスシテ夷狄ニ託ス。去レハ他日患ヲ遺スコト豈起ル可ンヤ。⁵⁰

峯源藏認為，現在清朝在上海借用英法的軍隊，如同後晉石敬瑭向遼借兵一般，為內部問題引入境外勢力，導致日後遼成為重大外患。而今清朝的不但借助英法兵力，甚至依靠英法軍隊協助守城。這些協防上海縣城的西洋士兵，也就直接住駐紮在城中。其中，上海縣城的孔廟成為了英國士兵的駐紮地。對此現象，高杉晉作描述：

去此道孔聖廟，々堂有二，期間空地種草木，結宏頗備，然賊變以來英人居之，變為陣營，廟堂中，兵卒枕銃砲臥，觀之不堪感嘆也。英人為支那人防賊，故支那移聖像他處，使英人居于此云。⁵¹

此外其他成員，例如日比野掬次、名倉信敦、峯源藏也都有寫下對於英軍佔

⁴⁸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頁116。

⁴⁹ 小島晉治，《幕末明治中国見聞録集成 第11卷》，頁30。

⁵⁰ 小島晉治，《幕末明治中国見聞録集成 第11卷》，頁33。

⁵¹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頁81。

據孔廟表示反感的紀錄。在此筆者認為，首先是孔廟腹地夠大，建築物也多，或許可能因此作為英軍駐紮地的選項。因此，儘管中國人不願意，甚至不願承認孔廟遭洋人佔據，但在戰亂之下需倚靠西洋部隊的力量，只能吞下。

在《「千歲丸」上海行》中馮天瑜說到，當時千歲丸成員對於洋人的囂張跋扈十分反感，也抨擊中國人的軟弱。在此筆者認為，當時正處戰亂，因此才會出現此行為。並非是中國人隨意讓英人侵占孔廟。且不只孔廟，當時上海許多廟、園也都被洋人部隊作為營房使用。⁵²在此筆者認為，這種中國人軟弱的印象，是千歲丸成員在特殊時間、地點所產生的印象，並非能夠完全反映當時中國的狀況。但這些觀察，多少也提示著千歲丸成員，若是國家遭西洋支配，又陷入內亂的話，會是如何的慘況。千歲丸成員觀察到的中國狀況對他們來說，可以說是一個負面的教材，提醒著他們不要讓日本重蹈中國的覆轍。

除了對於戰爭的觀察之外，高杉晉作和其他成員對於新式武器也是頗有興趣，因此留下了許多相關記錄，例如：

六月十七日，五代來談，午後與中牟田到英人之所預之砲臺，觀アムストロク砲，々十二ホント，方今我邦所傳大砲，大概自筒口入玉藥。此砲不然，自筒後入玉藥，故甚為便。英人アムストロク之所新制，以其名々其砲，此砲六口在上海云。⁵³

此砲為阿姆斯特朗砲，在之後的戊辰戰爭中也有被使用。而高杉晉作似乎對這些西洋軍械評價頗高，例如在與玩松的談話中：

高杉：「軍兵所操鍊，我以為多係威將軍兵法，或學西洋之銃砲陣法者有否。」

玩：「閣下多知兵法，而此地所招募鄉勇係農人多，現有英法二國關

⁵² 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頁168-174。

⁵³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頁83。

用鎗砲，賊見寒胆大振軍威。」⁵⁴

玩松云，向者請英法兵防長毛賊，近日又使我兵卒學西洋兵銃，因賊懼不能近，由此言，支那兵術不能及西洋銃隊之強堅可知也。⁵⁵

高杉晉作透過以上的對話，自己得出了西洋軍械較中國兵法還強大的結論。以上可見，在器械方面，高杉晉作在此行中也見識到了西洋軍械的威力，甚至覺得這些武器強力的威力，足以超越過去傳統的兵法。因此，筆者認為這些觀察多少也影響到了高杉晉作回國後的活動。例如在組織奇兵隊上，在第二次長州征討時，已裝備了新式的線膛槍，以及採用散兵戰術等方式，⁵⁶可見高杉晉作對於新式武器的信任及了解。

此外，當時千歲丸成員似乎是有一些與清朝規定有違的行為，例如高杉晉作寫到：「六月二十一日，至城內，徘徊街市。」⁵⁷而藤田佳久的〈幕末期に上海を訪れた日本人青年藩士たちの行動空間〉中繪製的地圖也能看出，名倉予何人、中牟田倉之助、高杉晉作三人都曾進入過上海縣城。⁵⁸縣城照理是不會讓外國人進入的。筆者認為可能是因為上海縣城一半為法國租界包圍，又因為當時處於戰亂，洋人軍隊協助防守，因此才准外人進入。此外，千歲丸成員到中國時仍攜帶其刀械，例如高杉晉作寫到：

予一日訪陳欽於西門……時英兵卒看予刀，欲看其內，予一拔之，使之看，如霜雪之寶刀，彼大驚，在要看之，予乃辭，彼不敢，因書之去。⁵⁹

上文可見，高杉晉作連拜訪中國人時，都帶著刀。但在中國是不准隨意攜帶刀械的。之後清朝與日本簽訂的中日修好條規中，也寫到「兩國商民在指定

⁵⁴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頁116。

⁵⁵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頁82

⁵⁶ 章霖，〈試論上海之行對高杉晉作攘夷思想的影響〉，頁12。

⁵⁷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頁82。

⁵⁸ 藤田佳久，〈幕末期に上海を訪れた日本人青年藩士たちの行動空間〉，頁156-170。

⁵⁹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頁113。

各口，彼此往來，各宜友愛，不得攜帶刀械，違者議罰，刀械入官。」此為清朝為日本量身訂作的項目，可見中國對於日本人的攜帶刀械的行為，是有警戒的。但千歲丸來航時，中日間並無國交關係，且事逢戰亂，可能因此沒有被關注到。

3. 思想的交流

在高杉晉作在與顏馨關於中國外夷問題的談論中，能看到當時中國人對於清朝的看法：

高杉：「貴邦堯舜以來堂々正氣之國，而至近世區々西夷之所猖獗則何乎。」

顏：「從是國運凌替，晉之五胡，唐之回紇，宋之遼金夏，千古同慨。」高杉：「國運凌替，君臣不得其道故也。君臣得其道，何有國運凌替，貴邦晉是之衰微，自以為災而已，謂之天命乎」⁶⁰

以上顏馨列舉中國各朝的外患，並與今日清之西夷做對比，可見其將清朝也算做是中國正統朝代的一個部分。然而，顏馨卻將宋朝視作為中國朝代的代表，將遼金夏視作為與之對應的外夷，與清朝態度不同。筆者認為，或許可以將此做為民間人士對於清朝中國的認識的一個例子。而在過往的朝貢體系論中，卻將西洋看做一個特異的外來影響。稱過的中國為傳統、停滯、前近代的，而西方的衝擊使得中國走出停滯，進入西方式的條約體系。⁶¹但從上述對話內容中可見，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今日的西方列強，就如同過去的外患一般，並未有甚麼特別的。而這也和日本人的認知，有著極大的落差。自從黑船事件後，日本不管幕府還是地方的雄藩，不管上層還是下層武士，都視西洋為特殊的外敵。在對外關係上，日本在此之後結束了「鎖國」體制，在政治上，也使得幕府權威受到動搖，天皇的傳統權威被雄藩利用於

⁶⁰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頁109。

⁶¹ 廖敏淑，〈中國是獨特的嗎：從清朝的外政及通商制度來着〉，收入《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頁227-228。

政治鬥爭，在經濟上西洋的進出則使得日本物價混亂，一揆四起。⁶²可見同樣是西洋勢力的進入，在中日之間卻有著不同的發展結果，因此在思想上同為日本人的高杉晉作，也會與中國人有所差異。因此，高杉晉作才會覺得「國運凌替」以及現在的亂象歸咎於中國自己治國不力，並非過往之常態。他認為中國輕視海防，不能善用軍艦，也無法製造新式火炮，甚至本國著作《海國圖誌》都絕版了，因此才導致中國如此衰微。⁶³

而另一個差異，則是展現在對於治理哲學的方面。在高杉晉作與蘇州同知溫忠彥的筆談中，可以見到：

高杉：「請問，宋朱文公所說格物窮理，與西洋人之所說窮者異否。」溫：「朱文公之格物窮理，即聖人之齊家修身，推進一層，不外乎誠之一字，貴乎實踐，不取鈞深，至西人所講，雖本乎理茅，近於術數，未免尚隔一層塵障，此論雖僻，鄙見如此，請教。」

高杉：「為義為利天地隔絕，不待言論而明。然治天下齊一家，內自誠心誠意工夫，以外至航海砲術器械等，盡不研窮至其理，則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齊一家也。不能窮航海砲術之等之理，則所以誠心誠意工夫之不至也。故以所謂利之器械為義是用，乃取捨中之道也，不然則口雖唱聖人之言，身已為夷狄之所奴僕矣。」

溫：「語多試佩陳，誠意正心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源，淺而約之，則誠正，推而致之則治平，道貫古今理周中外，至航海砲術等事不過格物致知之一端，聖人治天下以仁，不得已用兵，戰暴政所以全仁了，然否。」⁶⁴

溫忠彥認為，格物窮理、齊家修身其根本都在於「誠」，至於西方的技術等，則是較邊緣的術數小道。對於西方的航海砲術，不過種學問中的其中之一而已，軍事並非治國治天下的主要方策。相反地，高杉晉作認為，若是連術數小道都無法達成，遑論治國治天下。因此主張應重視西方技術，以免陷入器不如人導致被夷狄支配的慘況。而在高杉晉作其它文章中，也可以看

⁶² 廖敏淑，〈日本史教學大綱2020〉，<https://is.gd/uxa5mB>，擷取日期：2023年1月20日。

⁶³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頁85。

⁶⁴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日記及手錄〉，頁112-113。

到，其主張強兵之本在於人心，而強兵之末則是在學習洋術。可見他不只重視器械，甚至更重視治兵之術。⁶⁵

4. 高杉晉作的中國經驗的影響

關於這些觀察所帶來了影響，章霖認為，這次的中國經驗使高杉晉作的攘夷思想更加清晰明確，並使其思想產生變化，並在回國後積極從事正式活動。⁶⁶而橫山宏章則認為這次觀察使得千對丸成員加深了對於亡國的危機感，加速了幕末的改革。同時也萌發了蔑視中國的心理。⁶⁷而馮天瑜則認為千歲丸成員從這些觀察中得出了「開國不可緩」、「改革弊政不可緩」的感想，以及中國內政外交的衰敗，使得他們對往昔尊崇的中國產生藐視心理，也使得深蘊於武士文化之中的對外擴張性得以發酵。⁶⁸

但上述觀點常將視角拉至明治時期，從日本改革的成功回去看千歲丸成員的中國觀，不免有倒果為因之嫌。從高杉晉作的記錄來看，這幾個月短暫且特殊狀態的中國觀，難以反映中國的實況。筆者認為，高杉晉作觀察到的，多是中國在內憂外患下造成的慘況，因此此次中國經歷帶給高杉晉作的大多是對於西洋入侵、國家陷入內亂的危機感。

在對外關係方面，從後續高杉晉作魯莽地進行攘夷行動中看到，他若有詳細的了解列強和日本、中國之間三者的差距，應該不至於後續作出如此冒進的行動，可見其在中國的觀察，不論是對於中國還是列強的了解，並未十分深入。而在內政方面，在第二次長州征討中，高杉晉作拒絕恭順，使內戰產生，反而使得日本陷入內亂當中。⁶⁹可見，就如同其他所謂「維新志士」一樣，其中心思想是藩自身利益至上，至於所謂的攘夷、改革也是建立在自身利益之上進行的，因此他們高喊攘夷卻可以與外國人交易，高喊尊王卻挾天子以令諸侯。因此筆者認為，對高杉晉作來說，在思想上這次的中國經歷

⁶⁵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書翰〉，頁24-26。

⁶⁶ 章霖，〈試論上海之行對高杉晉作攘夷思想的影響〉，頁36-38。

⁶⁷ 橫山宏章，〈文久二年幕府派遣「千歲丸」隨員の中國觀〉，頁204。

⁶⁸ 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頁300。

⁶⁹ 廖敏淑，〈日本史教學大綱2020〉，<https://is.gd/uxa5mB>，擷取日期：2023年1月20日。

扮演了催化劑，促使高杉晉作對於攘夷的實行，但其思想的本質，還是受到早先學習經驗的影響，以及長州藩的利益至上的想法。

四、結論

從高杉晉作的經歷中可以知道，在求學時他受到恩師吉田松陰的影響極大。儘管有強烈的攘夷思想，但出於對家人的顧慮，高杉晉作在前往上海以前，與政治活動尚保持距離。然而1862年隨千歲丸渡行至上海，回國後高杉晉作便致力於各種政治活動，實現其攘夷的思想。

而從高杉晉作和千歲丸成員的觀察記錄中可以知道，在對外關係的觀察上，由於千歲丸成員以租界作為居所以及作為對中國的第一印象，再加上千歲丸成員和中國百姓在社會地位上的差別，千歲丸成員不僅常觀察到中國人作為洋人的僕役，也很容易產生對中國人產生負面的印象。在軍事觀察上，可以見到高杉晉作和千歲丸成員對於「華洋會剿」中引入西洋勢力的反感，同時他們也見識到於西洋新式武器在戰爭中發揮的作用。而在思想交流方面，高杉晉作與中國人有著許多的不同，可見高杉晉作在出國之前便已有自己的一套思想，並以此為基礎去觀察中國。

以上簡單列舉了一些高杉晉作和千歲丸成員於中國的觀察，並簡單討論了其中的內容。總結來說，筆者認為以上千歲丸成員的考察，多有以下的問題。由於在地理上，上海為與中國內地不同的開港場，而在時間上，當時則處於動亂時期。因此可以說，當時他們的觀察，多是在特殊的時間、地點上的特例，並非整個清朝中國的全貌。甚至與中國人筆談時，雖同是漢文，仍會有誤解。在這些情況下，可能就讓千歲丸成員產生了中國落後、軟弱的看法。但是並非所有的千歲丸成員的中國觀都和高杉晉作一樣。其中名倉信敦更是特別，他對十分熱愛中華文化，也十分地了解，甚至說「敝邦立國係封建，其制度文物，殆以貴邦三代之制」、「敝邦係封建其勢如貴邦周代列國時一般」，⁷⁰日後甚至主張日清同盟。

而關於這些中國觀對於高杉晉作的影響，可以說在思想上這次的中國經歷扮演了催化劑，促使了日後高杉晉作對於攘夷的實行。但需要注意的是，

⁷⁰ 森田吉彥，〈兵学者名倉信敦の幕末海外見聞〉，頁52-64。

其思想的本質，很多仍是基於出國以前的學習經驗，而所謂的「攘夷」以及「改革」，則是建立在長州藩的利益上進行的。而其他千歲丸成員，也有如高杉晉作者，回國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且多與日後的薩長政府人員高層關係親近，因此早期這些不甚完全的看法，也多少著影響著日後日本的政府人員的中國觀。

參考資料

史料：

1. 大塚武松編，《夷匪入港録. 第一》，東京：日本史籍協会，1930。
2. 小島晉治，《幕末明治中国見聞録集成 第11卷》，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
3.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商人擬來滬貿易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檔》。
4. 吉田松陰，《幽囚録》，東京：吉川半七，1891。
5. 高杉晉作，《東行先生遺文》，東京：民友社，1916。

中文書目：

1. 馮天瑜，《「千歲丸」上海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2. 廖敏淑，〈中國是獨特的嗎：從清朝的外政及通商制度來着〉，收入《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
3. 廖敏淑，《清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7。

中文論文：

1. 易惠莉，〈1862年日本「千歲丸」訪滬武士筆下的中國士紳考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4(香港，2004)，頁163-189。

日文書目：

1. 香川政一，《高杉晉作小伝》，下關：白銀日新堂，1936。
2. 森田吉彦，〈日清關係の轉換と日清修好条規〉，收入《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3. 川島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日文論文：

1. 横山宏章，〈文久二年幕府派遣「千歲丸」随員の中國観〉，《県立長崎シーボルト大学国際情報学部紀要》，3(長崎，2003)，頁197-206。

2. 吉野忠男、廣瀬朋美，〈人材育成の継承：松下村塾の事例(2)〉，《大阪経大論集》，65：2(大阪，2014)，頁293-302。
3. 車政弘、降旗英史，〈日本近代デザインの草創期：納富介次郎について その2〉，《デザイン学研究》，1977：26(東京，1977)，頁76-77。
4. 森田吉彦，〈兵学者名倉信敦の幕末海外見聞〉，《帝京大学文學部紀要》，40(東京，2009)，頁45-81。
5. 藤田佳久，〈幕末期に上海を訪れた日本人青年藩士たちの行動空間〉，《同文書院記念報》，24(豊橋，2016)，頁143-173。

學位論文：

1. 岡部三智雄，〈日本治臺前來臺日人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2. 章霖，〈試論上海之行對高杉晉作攘夷思想的影響〉，浙江：浙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4。
3. 謝詠，〈名倉予何人筆談史料初探〉，浙江：浙江工商大學亞非語言文學碩士論文，2017。

網路資料：

1. goo国語辞書：<https://is.gd/LWrgU1>（2023年1月19日檢索）
2. 廖敏淑，〈日本史教學大綱2020〉，<https://is.gd/uxa5mB>（2023年1月20日檢索）